

戰爭和戰
略問題

毛澤東

毛澤東
戰爭和戰略問題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張 $\frac{3}{4}$ · 字數12,000

1952年3月第1版 1952年5月重排

1966年5月北京第7次印刷

統書號1001·108 定價(三)0.07元

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書中，已經解決了黨領導抗日戰爭的問題。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否認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因此對於黨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上的方針，也採取了懷疑和反對的態度。爲着克服黨內這種右傾機會主義，而使全黨更明確地了解戰爭和戰略問題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首要地位，並動員全黨認真地從事這項工作，毛澤東同志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又從中國政治鬥爭的歷史方面着重地說明這個問題，同時說明我們的軍事工作的發展和戰略方針的具體變化的道路，從而取得了全黨在領導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出版者說明

本版《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書，是根據一九五二年八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載原文重印的。其中的註釋，按照單行本的需要，曾經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作了一些增減和修改。

目 錄

一	中國的特點和革命戰爭·····	一
二	中國國民黨的戰爭史·····	六
三	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	九
四	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	二一
五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	二五
六	注意研究軍事問題·····	二八

一 中國的特點和革命戰爭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資本主義各國，在沒有法西斯和沒有戰爭的時期內，那裏的條件是國家內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基於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後地推翻資本主義。在那裏，是長期的合法鬥爭，是利用議會講壇，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那裏的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在戰

爭問題上，那裏的共產黨是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了，黨的政策是使本國反動政府敗北。自己所要的戰爭只是準備中的國內戰爭〔二〕。但是這種戰爭，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羣衆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和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是首先佔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而不是與此相反。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佔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帝國主義沒有武裝進攻的時候，或者是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反對軍閥（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廣東戰爭〔三〕和北伐戰爭；或者是聯合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

級，進行反對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同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在帝國主義舉行武裝進攻的時候，則是聯合國內一切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階級和階層，進行對外的民族戰爭，例如現在的抗日戰爭。

所有這些，表示了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衆的組織和民衆的鬥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爲着戰爭的。在戰爭爆發以前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爲了準備戰爭的，例如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至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那一時期。在戰爭爆發以後的一切組織和鬥爭，則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例如北伐戰爭時期，革命軍後方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北洋軍閥統治區域內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又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區域內部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紅色區域外部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再如現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軍後方的和敵軍佔領地的一切組織和鬥爭，也同樣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

「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斯大林同志的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無論是對於北伐戰爭說來，對於土地革命戰爭說來，對於今天的抗日戰爭說來，都是正確的。這些戰爭都是革命戰爭，戰爭所反對的對象都是反革命，參加戰爭的主要成份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國內戰爭，或者是民族戰爭；或者是共產黨單獨進行的戰爭，或者是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戰爭。當然，這些區別是重要的。這些表示了戰爭主體有廣狹的區別（工農聯合，或工農資產階級聯合），戰爭對象有內外的區別（反對國內敵人，或反對國外敵人；國內敵人又分北洋軍閥或國民黨），表示了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程的各個時期中有不相同的內容。然而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戰爭，都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革命戰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一論斷，完全適合於中國的情況。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的和差不多開始就面對着的任務，是聯合盡可能多的同盟軍，組織武裝鬥爭，依照情況，反對內部的或外部的武裝的反革命，為爭取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而鬥爭。在中國，離

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

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着重於民衆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衆運動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許多同志把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市起義和白區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的轉變，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對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勝利之後。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有些同志仍舊沒有如同現在我們這樣想。

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認識這一點，對於今後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是有利益的。抗日戰爭中全民武裝反抗的具體事實，將教育全黨進一步地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每個黨員都要時刻準備武裝上前綫。我們這次會議又決定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戰區和敵後，更給了一個明確的方針。這對於有些黨員願作黨的組織工作，願作民衆運動

的工作，而不願研究戰爭和參加戰爭，有些學校沒有注意鼓勵學生上前線，等等現象，還是一劑對症的良藥。大部分中國領土內黨的組織工作和民衆運動工作是直接聯繫於武裝鬥爭的，沒有也不能有單獨的孤立的黨的工作或民衆運動。一部分距離戰區較遠的後方（如雲南、貴州、四川）和一部分敵人控制的地區（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黨的組織工作和民衆運動也是配合戰爭的，也只能也只應服從前綫的要求。一句話，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

二 中國國民黨的戰爭史

我們來看一看國民黨的歷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於戰爭，是有益處的。

從孫中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清的武裝起義〔四〕。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蹟〔五〕，直至辛亥革命，武裝推翻了清朝。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六〕。後來的海軍南下〔七〕，桂林北伐〔八〕和創設黃埔〔九〕，都是孫中山的戰爭事業。

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經歷了北伐、內戰和抗日三個時期。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爲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

辛亥革命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譚延闓〔一〕是一個聰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幾起幾覆，從來不做寡頭省長，要做督軍兼省長。他後來做了廣東和武漢的國民政府主席，還是兼了第二軍軍長。中國有很多這樣的軍閥，他們都懂得中國的特點。

中國也有些不要軍隊的政黨，其中主要的一個是進步黨〔二〕，但是它也懂得必須靠一個軍閥才有官做。袁世凱〔三〕、段祺瑞〔四〕、蔣介石（附蔣的）是進步黨之一部轉變而成的政學系〔五〕，就成了它的靠山。

歷史不長的幾個小黨，如青年黨〔六〕等，沒有軍隊，因此就鬧不出什麼名堂來。

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於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資產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共產黨員應該成爲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衆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

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戰而勝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三 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

我們黨雖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後的一個時期，對此也還認識不足；但是從一九二四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已進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經過援助國民黨的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黨已掌握了一部分軍隊〔六〕。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七〕、秋收起義〔八〕和廣州起義〔九〕，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

黨澈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沒有這一時期的紅軍及其所進行的戰爭，即是說，假如共產黨採取了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話，今天的抗日戰爭及其長期支持是不能設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在名義上反對政治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在實際上重新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兩個會議的內容和歷史作用是不一樣的，但是這兩個會議都沒有着重地涉及戰爭和戰略的問題，這是當時黨的工作重心還沒有放在戰爭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黨的中央遷至紅色區域以後，情形有了根本的改變，但對於戰爭問題（以及一切主要問題），又犯了原則性的錯誤，致使革命戰爭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則主要地是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反映。到今天爲止，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年的鬥爭中，不但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不但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政治問題，而且會運用馬克思主

義去解決戰爭問題；不但造就了一大批會治黨會治國的有力的骨幹，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會治軍的有力的骨幹。這是無數先烈的熱血澆灌出來的革命的鮮花，不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光榮，而且是世界共產黨和世界人民的光榮。在世界範圍內，還只有蘇聯、中國、西班牙三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三個軍隊，是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國的黨都還沒有軍事經驗，所以我們的軍隊和軍事經驗特別值得寶貴。

爲了勝利地進行今天的抗日戰爭，擴大和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我黨所領導的游擊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則下，黨應派遣最好的和足夠數量的黨員和幹部上前綫。一切爲了前綫的勝利，組織任務須服從於政治任務。

四 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

我們黨的軍事戰略的變化問題，值得給以研究。分爲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兩個過程來說。

國內戰爭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爲前後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主要

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主要的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組織上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和計劃性方面，其他則仍是游擊性的，低級的，不能和外國軍隊一概而論，也和國民黨的軍隊有些不同。因此，這種正規戰，在某種意義上，是提高了的游擊戰。

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就我黨的軍事任務說來，也將大體上分為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包括戰略防禦和戰略相持兩個階段），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戰略反攻階段），主要的將是正規戰爭。但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和國內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有許多不同的內容，因為是用正規性（某種程度上）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游擊任務；抗日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也將不同於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這是設想在裝備了新式武器之後，軍隊和作戰將要起一個大的變革而說的。這時的軍隊將獲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組織性，作戰將獲得高度的正規性，大大減少其游擊性，低級的將變到高級的，中國型的將變到世界型的。這將是戰略反攻階段中的事業。

由此看來，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兩個過程和四個戰略時期之間，共存